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萧三书信近千封,大部分为叶华桦赠)。由于通信对象不少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还有江青,或者多是文学界的经典作家,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臧克家,又不乏外国文学界友人,比如法捷耶夫、绥拉非莫维奇、布萊希特,而且,通信内容往往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左联”的解散、鲁迅与苏联的关系、从“反右”到“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事件,故其在历史与文学研究中的价值不可小觑。

目前,除了《萧三致鲁迅》《萧三苏联来信》《毛泽东致萧三》等几封具有重大文献价值的书信被公开,并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之外,绝大部分信件依然处于待发掘、待考证、待整理状态。特公开以下四封信,并作简要阐释,以供读者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肖”与“萧”常被混用(包括他本人),本文“点评”中的姓氏统一为“萧”,书信原文则照实录之。

甘露致萧三:

肖三:

你真会开玩笑!!你太无聊了!!刚才接市委组织部电话,告诉我你给我叁十万元,托刘长胜同志捐给我。刘交市委组织部,但组织部叫我去取。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我已告诉他们,请他们把钱退还给你。钱是旧社会压迫人用的唯一工具,领你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世界闻名的最高尚的诗人!!你也用钱来压迫我,你企图用钱来弥补你的罪恶吗?不可能!八九年來,尤其是最近五年來,我为你所遭受的损失、痛苦(这是无尽期的呵!)不是任何东西可以偿还的,钱就更不用说了。

还是拿出一点良心吧!

也许,这对于你们倒是有用处的,用它来把洋婆、洋娃打扮一下,到新年时,在北京街上逛逛吧!!在各种宴会里摆一摆吧,这样倒是可以引起许多人注意的。

甘露

1949年12月29日

点评:谈及萧三,不得不谈叶华、甘露这两位女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赋予作为“革命者”的甘露以巨大幸福感,然而,当1949年的某一天,萧三带着叶华母子回国,对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甘露而言,那种家破夫离的伤痛,该是多么巨大!萧三与叶华重修旧好,也许受制于过多的“政治因素”的考量,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给甘露带来的心理创伤,终究是无法弥补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但对甘露而言,即使“生死相许”,也无济于事。他们上演的也不过是当代版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爱而不得,进而不能,退而无助,恨而无奈,这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萧三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剪报读了,我不敢肯定鲁迅先生那首“无题”诗中“萧艾密”三字是何所指,当然作者的解释也言之成理。我只能告诉你:“萧爱梅”也不是我的原名,这是1936年曹清华同志给我取

# 考释萧三的几封信

□张元珂

的中文名字——从“Emi”音译成的,为了在“中流”杂志上翻译我在“真理报”上写的悼念鲁迅逝世的文章用。

Emi 原为 Emile,1921年起在法国用这个名字。那时音译为“埃弥”二字。1924年回国后写文章就用这个笔名,有时作“哀米耳”。在苏联音译 Emi Siao/埃弥·萧(或萧埃弥、称“小山兄”,或称“E.S.兄”。在他写这首无题诗的1933年,我们通过信互寄过书刊。我那时是“左联”的代表,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工作,在那边,有些活动,鲁迅先生也是知情的。

63.5.21

点评:这封信也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件,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一、萧三完整地梳理了自己笔名的变迁及用途。他对萧爱梅、“Emi”、Emi Siao、埃弥·萧、萧埃弥、“哀米耳”、“小山兄”,“E.S.兄”等称谓所做的说明,都可为后续资料发掘与研究提供难得的线索。二、萧三明确申明“萧艾密”与自己的笔名无关联。其实,鲁迅《无题诗》“一支青采来湘灵,九腕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中的“萧艾密”,本指一种恶草。在此,鲁迅通过用典,即“余既滋兰于九畹兮”(屈原《离骚》)、“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楚辞·渔父)),借对屈原高洁品性及美好形象的赞美,间接表达了对时局的厌恶和批判。

臧克家致萧三:

萧三老友:

今天下午,你的诗集和你的信,同时到我手。我灯下一一将错别字改正。在扉页上题上了下面这样的四句:“去年七月赠我书,今年二月才收到。收发室中积压如此之久,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的诗,爽快易上口,心中有豪气,我喜欢这样性格,不喜欢“朦胧诗”,也不喜欢太散漫的“自由体”。

你年高,身体弱(?)些,望珍重。我小于你,也七十七岁了。虽不常见,但常怀念。老友,老友,心中老肖(有)呵!

握手

克家

1982年2月8日

点评:臧克家的幽默、直率、重情,由此可见一斑。此信既可见证臧克家与萧三的真挚友谊,亦可显示晚年臧克家在“朦胧诗”论战中的立场、观点。

萧三致中国作协党组:

作协党组:

我因久病没有痊愈,不能出席这次的理事会(扩大)会议,很是抱歉!但是,我对作协的工作,特别是对繁荣创作问题,还是很想提点意见的。最近读了萧洛霍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觉得对这个问题——创作问题很有参考价值。我建议赶快请人把这篇尖锐的发言翻译出来,发给大家看看,一定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萧洛霍夫发言的某些点,自然还是可以争论的,但关于作家必需长住在他所描写英雄所住的地方,真正深入生活这一层,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议我们作协要下力动员作家长期地下去,下决心搬到农村,搬到厂区常住,去“立家”,取消现有的“驻会作家”这个怪名称,这个制度。

作协再不要在北京和各大城市为作家盖房子,造宿舍了,有钱宁肯帮助下去的作家,在农村和厂区修住所。

现在已有个别作家,或早已住在原来自己的家乡,或已搬到本省本县住——这都是很好的。作协还可以动员许多作家这么做。常言道:“要作长期打算”,我意思是:要作产生不愧于我们祖国、人民、时代的真正伟大作品打算。我意思是,不是在几年之内,我们每个作家都成为非常熟悉当代生活的作家,而要在十年二十年乃至终身,才能“非常熟悉”他所写的人和生活。

这是我在读了几个报告的稿子之后,愿意提出的一点意见。不全面之处,请原谅。我自己这个“作家”已差不多成了萧洛霍夫所说的“死魂灵”,没有说的,但望不以人废言!等病好了,只要能(够)活动(走动),我一定争取至少到全国各地去看,写点特写,总该是可以的。

这信断断续续写了几天,今天本打算去理事会,参加开幕会议的,但一早起来就头晕得很,只好不去;这封信交通(讯?)员带去。

顺致 同志的敬礼

萧三 1956.2.27

点评:萧三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提出过不少有建设性的意见或改革方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总还是期盼鲁迅、茅盾那样的大家出现,总还一厢情愿地期待《子夜》《山雨》《骆驼祥子》那类足可匹配并超越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出现。属于新生代作家的时代早已来临,可真正熟悉这个时代城乡生活、创作展露大气象、艺术表现超凡脱俗的新生代作

这封萧三致丁玲的书信写于1942年,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寄给丁玲本人,而是经过修改补充之后,直接寄给了《解放日报》总编辑博古同志。一封原本要寄给当事人的信,却中途改道寄给了第三者,这第三者的身份又是当事人的“顶头上司”,萧三在信的开头开宗明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为了我的一篇捞什子(“谈‘带枪的人’在延安的演出”),前后花费了你许多时间和笔墨,本也值得再说什么了。但是接你退还我的声明和附来的信之后,我却有不能已于言者,愿为同志陈之。”萧三是那种心里藏不住事情的人,好不容易打定主意不说,现在接到了丁玲的退还声明后,内心的不满一触即发。从“首先——谈到文章本身——其次——再重复几句”的行文架构上看,萧三也经过稍许沉淀。

《带枪的人》是包艺廷的第一个关于列宁的剧本,于1940年被译成中文。据戈宝权在《列宁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谈列宁的光辉形象在舞台上》中的论述:“1941年7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戏剧系和华北联大文工团,就在晋察冀边区联合演出了这个剧本(由牧虹改编演出)。同年为了庆祝伟大十月革命24周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剧院又再次上演了这个剧本(由于学伟扮演列宁)。”据严正(扮演萧三大林)回忆,他们实验剧院在七八月间连续排演,直到1942年元月一日才初演成功。《回忆王演教我演斯大林》)

在那个可歌可泣的革命年代,萧三是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我没有闲心,去描写那风花雪月,去享受那良辰美景”。在这条文艺战线上,萧三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作擂鼓来捶,为革命事业呐喊助威。这篇《谈(带枪的人)在延安的演出》也是一样,他在12月26日晚看过戏之后,27日夜里就急写完文章,周末两夜两天到29日寄给丁玲。前面说到实验剧院的初演在元旦,如果丁玲能够在新年之前就将之发表在日报上,那么这篇文章无疑将起到很好的预热效果,可以“使得观众更踊跃,更了解”,更何况身为党报的《解放日报》更有这种责任做好党的文艺宣传工作。现实结果却在萧三意料之外,久不见日报刊载,反倒隔了10日后才收到退稿。因为错过了大好的预热时间,所以萧三才觉得“这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好在初演成功收效颇丰,《带枪的人》还在继续上演,热

## 「文人心直」的萧三

□汪静如

潮尚未消退。萧三于8日早上收到退稿后,当晚即加紧整理修改,去除芜杂,第二天着人再送,不幸于14日才见刊,这时戏剧早已演完多日。现在,这篇文章恐怕是连“小部分的意义”都失去了,萧三如何不痛心?当时作为《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同志是失职了。此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丁玲,其文艺观与诗人萧三可能不尽相同;作为党报文艺栏的负责人,她所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但事情恐怕还不止于此。

20世纪40年代初,正是延安整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异常关注文艺界的思想状况,当时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名流,他时常和这些人讨论文艺界的问题,逐渐地酝酿出了1942年5月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三、丁玲、艾青等都在场。其时萧三的“文人心直”在会上就可见一斑。在王政明的《萧三传》中记载,5月1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突然在萧三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指责他在发言中引述高尔基的文学主张是‘贩卖别人的东西’。虽是“文人心直”,虽是情绪激动,当时的萧三和信中的他一样懂得冷静、沉着,顾全大局,“但是在方便场合,我是会忍不住要说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果然,当大家过来安慰萧三的时候,他再没有掩饰会上的委屈,“我多说了几句高尔基的文学主张,这有什

么不对?怎么能说是‘贩卖别人的东西’”、“我的一大篇发言,是不是被他的一句话就完全取消了?”可见萧三的真性情。

信中谈到文章本身,萧三直言,丁玲的主观主义太严重,而这正是萧三气愤的关键。“主观主义”在这一时期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须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号召全党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也是整场运动的重中之重。萧三给丁玲戴了顶沉重的“帽子”。换个角度说,也许正是出于党内同志的直率,才敢批评得如此毫无顾忌。第一次的退稿,除了行文杂乱之外,更重要的是萧三的观点与“许多人”意见完全相反,故退而不用。第二次投稿,萧三自认为不再杂乱,也接受了“许多人的”意见,但发表出来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到是丁玲的主观意见占优势(信中言)。萧三此时就按捺不住怒火,“新账旧账”一块儿算。原本与“许多人”的意见完全相反,并不违背言论思想自由的主张。现在强加了丁玲的观点,萧三觉得甚为不妥,“再不合适,还是不登,岂不正大光明?”萧三直言,丁玲过分的“增删斧削”几乎是对原文本意的歪曲或改变,所以他不能苟同。最让萧三无法接受恐怕是丁玲同志的处理方法,事前没有征得本人同意。萧三认为,无论如何增删,尊重作者是最低限度。那么,丁玲是否因为评论的“意见不妥”又碍于情面一定要发才亲自捉刀呢?还是时间紧迫来不及沟通增删完就直接发表了昵?

“好了,这口气,我只好咽到肚里去。但是在方便的场合下,我是会忍不住要说的,因为‘人’便贵有骨头,文章也有其‘文格’。我从十四号晚上读到了那篇登载出来的东西之后,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能宁静下去。”可见这篇文章在萧三心中的分量之重。从信末看到,这是萧三第一次写影评,而这第一次就被丁玲当头棒喝了,阴影不可谓不大。一个在国际上早已成名了的诗人,转行做评论文章的时候,恰巧遇上了严苛的编辑,该是令萧三没齿难忘的。他信中还提到那个可怜的打算——将原稿寄给实验剧团,但原稿不小心被工人弄丢了。正在气头上,较真的萧三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他最后还要再重复几句:“不满意你的主观主义的增删,特别在于评田方同志‘有些地方变成了滑稽’(因为我直到现

在都不觉的他滑稽),在于改成‘整个剧的处理……欠条理和节奏?’(而且读去多不通呵!)”他最伤心的改动就在此。从“我声明,我并没有受实验剧团的什么贿赂,而想拍他们的马屁或者‘恭维’(来信中字)一番。所有我的批评都是出于至诚。现在被你换成一瓢冷水,自然是大背我的初衷”。可以推断,萧三对演出的肯定要大于批评,而丁玲的改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评论的肯定之辞。

事实上,严正的回忆文里对萧三的评论是肯定的:“萧三写了评论文章,肯定了该剧,尤其肯定了列宁、斯大林这两个角色。对有些场次虽然认为有些许不足,但认为整个演出是个壮举。”后来毛泽东和萧三谈论文章的时候也提到:“你的散文写得很生动。我读了你写的《论‘带枪的人’的演出》……都写得很好。”可见,丁玲的冒昧修改并未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文章的质量。

所幸,这场文案并没有对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产生很大影响。在1942年5月紧接而来的文艺座谈会上,他们都自觉地充当起文艺工作的排头兵桥头堡,就戏剧创作、就创作中的光明与黑暗等问题,都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1942年丁玲因为写作《三八节有感》受到批判,萧三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在丁玲那段“灰溜溜”的日子里,萧三还鼓励了丁玲,将毛主席的话转达给她:“丁玲有进步,报上批评她的文章太厉害了,要支持帮助她,不要把她和王实味一样看待。”1947年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的54章,两份复写稿一份自留,另一份只给周扬和萧三看过。周扬当时主管华北宣传工作,小说的出版需要过他这一关,初稿便贵有骨头,文章也有其“文格”。我从十四号晚上读到了那篇登载出来的东西之后,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能宁静下去。”可见这篇文章在萧三心中的分量之重。从信末看到,这是萧三第一次写影评,而这第一次就被丁玲当头棒喝了,阴影不可谓不大。一个在国际上早已成名了的诗人,转行做评论文章的时候,恰巧遇上了严苛的编辑,该是令萧三没齿难忘的。他信中还提到那个可怜的打算——将原稿寄给实验剧团,但原稿不小心被工人弄丢了。正在气头上,较真的萧三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他最后还要再重复几句:“不满意你的主观主义的增删,特别在于评田方同志‘有些地方变成了滑稽’(因为我直到现

## 萧三手稿管窥

□冯 超

据萧三秘书高陶回忆,萧三曾多次表示:“文章还是再三推敲,‘事后至少看两遍’为好,不必急于拿出去。”甚至在改了又改的文章送到报社或出版社后又发现了不妥之处,依然要追回来再修改,因之其手稿上就留下了许多增删填补、圈点涂抹的痕迹,而这正是以深入挖掘历史遗迹、客观窥探创作心理、具象勾勒艺术行为为目的的研究者深为在意的。

《欢迎中国女排凯旋》创作于1981年11月22日,是萧三在听闻女排夺冠后拖病体手书的一首现代诗,也是诗人生命中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原稿写于中国作家协会的格子稿纸上。其时诗人已85岁高龄,虽思维清晰、诗情高涨,但毕竟年事已高,手稿显得略为凌乱,字迹也颇为潦草。从第1行“我老汉活到了八十五”到第14行“我们已经牢牢站住”就有20多处修改,甚至连题目也变动有三。就手稿来看,诗人初作此诗时使用的是深颜色的粗笔,诗名即为印刷本上的《欢迎中国女排凯旋》,但又曾增添,在“凯旋”之后加上了浅色细笔书写的“归来”二字。“凯旋归来”在连用后虽然具有难以用其他词语替代的表达效果,但事实上却造成了一定的语义重复。更重要的是与诗人立志“要为广大设想,竭力来作浅显易懂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的作诗原则相背离。由此看来,印刷本上最终没有增加“归来”二字却有相当的考虑和充分的理由。

出于此类原因而在手稿上作出修改的还有多处,如首句“亏我活到八十五”就改为“我老汉活到了八十五”,修改笔迹显示,诗人先删掉了“亏”字,后又增加了“老汉”、“了”两处,使诗句变得更加口语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第二句中的“今天才亲见‘出生虎’”,改为“今天才亲见‘初生虎’”,取“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旨在赞赏中国女排姑娘奋勇拼搏、不畏强敌的战斗精神。第三句“中国儿女立奇功”改为“中华儿女”,在大大拓宽了范围的同时,也让华夏同胞分享这一胜利的喜悦。从手稿上的涂抹痕迹来看,改动最大的应该是第四句“全国敲锣又打鼓”。起初诗人写为“鸣金又击鼓”,又改为“欢欣又鼓舞”,再三涂抹后最终定为“敲锣又打鼓”。仅从意思来看,三种表达基本相同,但鸣金击鼓是古语词,略显雅致;欢欣鼓舞的情感色彩又比较平淡;惟有敲锣打鼓既通俗易懂又能将全国人民欢乐兴奋的状态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可谓恰到好处……诸多增添、删除、修改、渲染的地方无法一一列举,但这些修改涂抹而成的斑斑墨迹正是诗人践行“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但求其,写出来,像人说话……”(《我的宣言》1941年)等诗歌主张的实存明证,又是诗人严肃认真写作态度和惜墨如金良苦用心的绝佳注脚。

从书法文化的角度看,他常以一种相当自觉的书法文化创造精神将诗歌与书法相结合,因之其手稿不仅堪称是文学生产的“第一和惟一文本”,而且也具有传世的文物价值和书法价值。萧三出生于湖南湘乡,萧三的父亲是一位精通经史、

家还没出现。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作家们应该到基层去——长期扎根在农村、工厂、社区,倾听当代中国最真实的声音,记录当代中国最真实的光影,探索并实践叙述当代中国最为恰当的艺术形式。

萧三致甘征文、韩少功:

甘征文、韩少功同志:

关于任弼时同志的生平,我忘记了向你们谈一件事,现补充如下:

1943年春夏之交在延安我们谈及本年冬天毛主席满50岁了,弼时同志郑重地对我说:“肖三同志,你写一本毛主席传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何如?”

38年他在苏联读了我在一个刊物上发表的“毛泽东”长文,又为我介绍那时也在莫斯科的李广同志(后来知道即滕代远同志)谈朱德同志的生平故事,我们谈了好几次。39年初我写了“朱德”,一篇传略报告。“国际文学”编者说有艺术性,用英文、法文、德文等发表了。

弼时同志当即用铅笔(那时在延安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都惯用铅笔写信便条)写了一个(封)信给谭政同志,后又写信给陈正人同志一信,都是介绍我去谈毛主席革命实际(践)的。当时在中宣部负责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极力赞助,要我用两个月的时间找人谈话,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恰好就可以赶上毛主席五十岁生日了。乔木同志并要管理局安排我的生活,并说,我可以不去党校参加整风,审干,专写毛传。

毛主席坚决不肯做寿。我的谈话对象也越谈越多。当然两个月是谈不完的。以后多年,我在延安、在晋察冀、在北中前线、集平、平山……都找人谈了,于1927年冬写成到粉碎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的初稿,和一篇万言的关于“七大”的比较全面的文章(当时打算写到“七大”为止),但这篇材料宝贵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时遗失了,以后我又被迫停止写作十多年。54年写成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现在才得以重新拿出来整理、修正、补充。弼时同志的嘱咐,我恐怕无法完成了,想来至深惭愧与感念!但所收集的材料虽笔记本遗失殆尽,但一部分仍散见于我偶存的稿件中,全传写不成,至少可以作为修党史者的参考。党史是毛史、毛传;他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实践,同志们又可以续写下去,写党史——毛传,不是吗?

肖三

78.8.3

点评:萧三是第一个为毛泽东写传的人。他在致甘征文、韩少功的信中,介绍了写作缘起,经过及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事件。他说:“党史是毛史、毛传”的观点,虽不免偏颇,但确实戳中了述史之根脉。“毛史”有诸种写法。肖三的“毛史”仅是其中一种。因是初次实践,意义当然深远。但真正史学意义上的“毛史”,还有待掌握新史料,运用新史观、新方法,有胆识、有才华的后来者来写。写好“毛史”,也即弄明白了中共党史,反之亦然。